

留学经历对中国二语学习者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影响研究

戴方方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为探究留学经历对中国二语学习者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影响, 对12位海外留学归国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开展深度访谈。基于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 将影响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影响持久性的关键因素划分为4个类别: 个体对留学经历的感知与调适、社交范围与交流意愿、文化包容度和回国后使用二语机会和文化差异和逆向文化冲击。研究发现, 不同特征的学生对留学经历收获有不同的感知, 初始二语语言水平会影响学生的社交范围和交流主动性, 逆向文化冲击也对个体产生重要影响, 留学经历对中国二语学习者跨文化交流能力影响的持续性因人而异。为优化学生留学体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建议进行针对性的培训指导, 促使留学生适应环境; 提供充足的互动机会, 通过语言强化和激励促进跨文化交流, 采取干预措施助力其平稳度过回国“过渡期”。

[关键词] 留学经历; 二语研究; 跨文化交流; 社会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 G 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2024)05-0048-09

一、引言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关键内容, 留学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强化科技与文化交流、满足人民多样化教育需求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我国积极推进留学事业发展,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强调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重要推动力, 体现出我国对培养国际化人才、拓展教育合作交流广度和深度的高度重视。21世纪以来, 我国留学人数不断攀升, 回国浪潮持续翻涌。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和信息传播的“去圈层化”使得接受海外教育已从“精英化”逐渐走向“大众化”。通过出国留学, 学生置身于一个类似于儿童母语习得环境、以第二语言为思维工具、具有“强迫性”的社交和学习环境^[2]。二语

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简称 SLA) 包括儿童和成人以不同动机、能力和目的在正式、非正式及混合环境中, 学习和应用第二语言 (L2) 的过程。从事二语习得研究的学者将语言学习环境分为国内正式的二语学习语境 (At-Home Context, AH)、国内强化型或浸入式语境 (Intensive or Immersion Context, IM) 和出国留学学习语境 (Study-Abroad Context, SA) 三类^[3]。与前两者相比, 出国留学学习语境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在真实情境下使用外语和了解异国社会文化的机会。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 跨国交流项目中不乏有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中国学习者。尽管出国留学被普遍认为能够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和跨文化交流技能, 然而这一论断主要基于经验感知, 留学经历对中国二语学习者, 特别是对归国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发展变化的实证研究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因此, 在我国出国留学群体规模不断

[收稿日期] 2024-05-31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2022年“高级访问学者”项目(202008350005)

[作者简介] 戴方方(1983—), 女, 福建莆田人,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美国后殖民文学。

扩大的背景下，对曾在出国留学语境下生活学习、可能回国后面对逆向文化冲击的中国二语学习者跨文化交流能力发展的关注便显得尤为重要。

二、研究现状与问题

语言的核心功能包括记载、传承文化和作为互动交流工具。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非常重要。有学者将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核心内涵定义为“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跨文化同理心和批判性文化意识、能得体有效地进行跨文化沟通且能帮助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4]。语言交流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是跨文化语言学习者需具备的两种能力。前者指个体在跨文化互动中进行连贯有效沟通的能力；后者指个体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以及在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之间建立起积极交流联系的能力^[5]。

语言学习中“理解”和“产出”两种能力之间往往不对称，在国内的二语学习环境中，采用外语材料来模拟留学语境下的语言输入，进而提高学生的理解型技能（听力和阅读）并不困难。然而，要“有效地进行跨文化沟通”并提高学生的产出型技能（口语和写作），则对语言输出环境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有着更高的要求。目前如何有效提高二语学习者的产出型技能的研究已引起第二语言教学界的高度重视。

（一）文献综述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学者们进行了参与出国留学项目对学习者的二语交流的影响评估研究。一些研究者考察学生出国学习与二语熟练程度之间的关系，特别探究短期留学项目是否能显著影响参与者的口语和听力技能^[6]。艾伦（Allen）等人认为，学习者在3~12个月的留学期口语和听力技能取得最实质性的进步^[7]。阿穆兹（Amuzie）和温克（Winke）指出，更充裕的留学时长可能促进了学习者积极参与目标语言的学习，出国留学时间更长的学生比时间较短的学生有更强的学习自主性。还有研究表明，在留学初始阶段，学习者的语言感知和理解水平就获得了明显的提升^[8]，然而，在留学结束或即将结束时产生的一些学习效果可能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因此需要定期重新评估。此外，语言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很有可能在留学生回国后才显现出来^[9]。

一般认为，出国留学为二语学习者提供了真实、准确的语言输入与输出环境，与在国内二语学习语境相比，学生能更充分地接触目的语所在国的媒介^[10]。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出国留学并不必然导致二语技能的提高，学习者的初始二语语言水平就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马丁森（Martinsen）提出，在具有留学经历的学生群体中，语言熟练程度中高水平的学生相比于低水平的学生表现出更为显著的进步^[11]。姜大民（Kang, Dae - Min）也支持这一观点，即语言学习者需要达到特定的熟练水平才能从留学经历中获得最佳效益^[12]。弗里德（Freed）还指出，当前关于出国留学语境下留学项目有效性研究的数据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调查仅采用一种测试成绩证明出国留学项目的有益性，缺乏衡量二语学习者在出国留学语境下语言发展的标准^[13]。

除二语技能外，众多研究者也调查了留学对学习者的自尊、动机、语言使用信心和跨文化敏感性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诺埃尔斯（Noels）等人的研究强调了在二语习得中同化的关键作用。他们对一组在加拿大的中国学生进行了研究，发现那些能够融入加拿大文化的学生养成了相似的生活方式，也表现出更高的英语自信心^[14]。虽然这项研究探讨了语言自信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作用，但仅采用了横断面方式，提供参与者在特定时间点的情况概览。杰克逊（Jackson）以参与某为期5周的赴英留学项目的15名中国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究留学经历对语言学习、文化理解和身份认同的影响。受访者认为，留学经历提高了跨文化沟通技能，重塑了自我概念和身份认同，有学生甚至回国后出现逆向文化冲击现象。该研究的一个优势在于在一个强大的理论框架内展示数据，对研究结果的分析更加全面和结构化。在书中，他强调那些表现出较大进步的学生是那些对身份重构持开放态度并主动与东道国成员接触的学生。该研究关注的是语言能力的即时或短期提高，个体能动性和社会互动对语言习得的长期影响尚需探索。跨文化理解能力通常通过自我报告问卷结果来衡量，还有研究将跨文化能力的提升与海外居住联系在一起。然而，对于学习者的跨文化能力如何与社交相关，以及这种关系对二语发展的影响，目前的研究仍然比较有限。

在研究对象上，已有研究忽视了中国学习者在留学目的国学习二语的情况，研究方法以量化研究

为主, 缺乏对现象背后折射出的留学生心态及情感变化的深度透视。针对前人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探究问题包括: 对于在海外留学一段时间后归国的中国二语学习者, 留学经历对其产出型二语技能影响如何? 不同二语语言水平的学生与同胞、教授、同学及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士进行社交互动的范围和频率是否相同? 其对于培养跨文化理解能力和促进个人发展是否会产生持久影响? 以上问题的解答对于探究二语技能的发展规律、助力海归青年健康发展和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二) 理论基础

维果斯基 (Vygotsky) 是社会文化理论 (Sociocultural Theory) 的始祖。社会文化理论是关于人类认知发展的理论, 重视社会文化因素或环境在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该理论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高级认知功能是人类在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过程中, 通过使用语言逐渐发展起来的。语言作为人们交流互动的思想工具和媒介, 在高级心理功能的发生和发展中起核心作用, 人们的思想就是通过语言这项认知活动得以形成的。维果斯基还在 1934 年提出“perezhivanie”概念, 该词的词根为“zhit”, 意为“生活”; 其前缀“pere”, 意为“跨越”或“再次”; 动词“perezhivat”表达了“经历某件事”; “perezhivanie”则意为“生活体验”, 指人们对当下或过往所处情境的体验。他将“perezhivanie”作为探究社会文化环境对个体心理发展影响的分析单位, 试图通过该概念捕捉处于人类意识核心的情感与认知, 帮助理解人们在社会历史建构过程中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转变。

社会文化理论还高度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intellectual agency) 在学习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维果斯基认为, 认知发展不是现有社会文化资源和实践的文化适应或挪用, 而是以适应个人和当地需求的方式重建和转变这些资源和实践的过程。能动性与社会活动以及用于规范活动的语言相互作用。这表明二语技能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需要个体努力, 如果没有主观能动性, 即使空间和位置发生变化, 个体能力也可能不会发生明显改变。通过引入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 构建留学经历对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作用机制模型, 准确描摹中国二语学

习者的群体画像, 从认知和心理视角进一步阐明出国留学语境下跨文化交流能力提升的驱动逻辑。

三、研究方法 with 资料获取

(一) 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遵循建构主义, 依赖研究者直接进入研究情境收集资料, 并对研究情境中的意义和关系进行描述、分析和揭示^[15]。研究者可以深入理解个体的经历和观点, 弥补了定量研究可能忽视其内心想法、期望和态度的不足。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利用访谈法和内省法探究具备高等教育水平的中国二语学习者回国后对其留学经历的感知。内省法为研究者提供了思维认知过程这类特殊数据, 通过内省法的独特视角, 可以探究学习者个体如何从留学经历中获取价值和建构自我认同。本研究综合考察了触及参与者情感、态度和观点的感知数据, 考虑个体如何对他们的经历做出解释, 而不仅仅关注某客观事件。研究目的包括探究留学经历如何影响二语学习者产出型语言技能及其跨文化交流能力, 并挖掘背后的作用路径, 因此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更具可操作性。每个受访者独到的观点和态度不仅影响了他们的文化认知和思维模式, 也关系到他们对留学经历的理解及留学后的人生选择。通过访谈法和内省法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个体如何在留学生活中定位自己和解释他们的行为, 有助于深入探索他们的留学经历对跨文化交流能力产生的影响。

(二) 样本选择

本研究以“目的性抽样”“异质性抽样”的抽样策略选取访谈对象, 共选取 12 位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中国籍留学者, 其中 9 位为男性, 3 位为女性。参与者曾在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英语国家生活学习 1~2 年不等。访谈对象的英语水平各不相同, 其中 1 位英语水平较低, 1 位中等, 其余 10 位英语水平较高^①。留学项目涵盖多个专业, 有部分参与者在留学之前曾有过英语国家旅行经历。绝大多数参与者留学期间与其他母语非英语的国际生合租公寓, 只有两位参与者在某段时间内与当地寄宿家

① 本研究基于雅思“标准化语言测试”划分学习者的英语水平, 这有利于确保研究结果的普遍性。(REN, W. L2 Pragmatic Development in Study Abroad Contexts [M]. Bern, Switzerland: PeterLang, 2015.)

庭同住。故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平衡了不同性别、不同专业和不同初始二语语言水平的学习者，受访者均已完成至少一年的海外学习，具备一定的出国留学经历，并有强烈的分享自身心得体会的意愿。因

此，本研究收集的资料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二语学习者在出国留学语境下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发展情况。所有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 编号 | 代名 | 年龄 | 性别 | 留学国家 | 专业 | 留学时间 | 回国时间 |
|-----|---------|-----|----|------|-------|------|------|
| R01 | Hannah | 23岁 | 男 | 英国 | 数字社会学 | 1年 | 5个月 |
| R02 | Keria | 23岁 | 女 | 英国 | 国际关系学 | 1年 | 4个月 |
| R03 | Way | 23岁 | 男 | 新加坡 | 微电子技术 | 2年 | 6个月 |
| R04 | Cesar | 22岁 | 男 | 英国 | 管理咨询 | 1年 | 3年 |
| R05 | Judy | 40岁 | 女 | 英国 | 传媒与传播 | 1年 | 14年 |
| R06 | Bruce | 27岁 | 女 | 英国 | 经济学 | 1年 | 3年 |
| R07 | Michael | 40岁 | 男 | 英国 | 同声传译 | 1年 | 5年 |
| R08 | Jack | 33岁 | 男 | 比利时 | 公共卫生 | 1年 | 5年 |
| R09 | Hunter | 27岁 | 男 | 美国 | 运动科学 | 1年 | 8年 |
| R10 | Aron | 23岁 | 男 | 美国 | 酒店管理 | 1年 | 10年 |
| R11 | David | 32岁 | 男 | 美国 | 生物工程 | 2年 | 5年 |
| R12 | Leon | 34岁 | 男 | 加拿大 | 物流管理 | 2年 | 10年 |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访谈提纲在国内外二语习得、跨文化能力相关研究基础上，征求专家意见自行设计，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semi-structured depth interview），首先向受访者询问就读专业、留学时长等基本信息；其次着重了解其在留学期间的学习体验，围绕学习体验探究其产出型二语技能的提升情况、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发展过程等，包括留学带来的改变是否具有持久性、回国后是否遭受逆向文化冲击等方面。访谈者在提问的同时也鼓励受访者表达看法，并根据访谈的具体情况对访谈的内容和流程进行灵活调整。每次访谈均充分展开所有问题，持续时间约为80min。由于研究问题的集中度高，访谈信息较快达到了饱和。在访谈前对受访者进行口头承诺访谈的隐私保护策略，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全程录音，转录为文本后用Nvivo 12.0质性分析软件进行整理归纳和编码分析。在编码过程中，以“留学经历感知与应对”“社交范围与交流意愿”“影响与持久度”“挑战与限制”为父节点，分别提取出34、36、43、15个参考点，以“留学经历带来最有益收获”等为18个子节点，表2为访谈文本

节点编码统计表。

研究者随机抽取了9份文本进行编码分析，预留3份访谈文本用于检验编码结果的理论饱和度。在对预留的3份访谈文本编码分析的过程中并未出现新的概念和类属，说明研究的编码结果具有较高的理论饱和度。

四、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留学经历对中国二语学习者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影响

在国外生活和学习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对个人和职业发展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访谈发现，不同特征的中国二语学习者对留学是否提高了产出型二语技能水平、留学是否对自我认同及文化包容度等方面产生持久影响的认识理解存在差异。接下来本文将从“感知与调适、范围与交流、影响与持久度、挑战与限制”这4个方面展开，描摹中国二语学习者在出国留学语境下的群体画像，分析留学经历对中国二语学习者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影响路径。

表 2 访谈文本节点编码统计表

| 父节点 | 父节点参考点 | 子节点 | 子节点参考点 | 子节点覆盖率/% |
|-----------|--------|--------------------|--------|----------|
| 留学经历感知与应对 | 34 | 留学经历带来最有益收获 | 12 | 5.89 |
| | | 对留学经历的满意程度 | 10 | 4.73 |
| | | 对寄宿家庭的看法 | 5 | 2.17 |
| | | 调整不适应感的举措 | 7 | 3.26 |
| | | 和母语为英语同学的交流 | 6 | 4.77 |
| 社交范围与交流意愿 | 36 | 和教授的交流 | 3 | 2.67 |
| | | 和中国同胞的交流 | 6 | 4.92 |
| | | 初始英语水平是否影响社交范围 | 10 | 6.78 |
| 影响与持久度 | 43 | 交流主动性及影响因素 | 11 | 6.93 |
| | | 留学是否必然带来二语水平提高 | 9 | 4.19 |
| | | 留学带来二语水平提高条件 | 7 | 3.56 |
| | | 留学对二语技能提高的持久性 | 5 | 3.18 |
| | | 留学经历对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影响 | 10 | 5.25 |
| | | 文化洞察力和文化包容度的改变是否持续 | 8 | 4.88 |
| | | 民族意识、文化自信与爱国教育 | 4 | 2.97 |
| 挑战与限制 | 15 | 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 | 7 | 3.29 |
| | | 受到逆向文化冲击的表现 | 5 | 2.58 |
| | | 回国后是否花很长时间适应国内生活 | 3 | 0.27 |

（一）感知与调适：多元化的留学经历感知与个性化的应对策略

访谈中以“留学经历带来最有益收获”为节点，共得 12 个参考点，不同受访对象对留学经历带来最有益收获的理解可以概括为 6 类，即锻炼独立生活能力、拓展学术视野、明晰职业目标、增强自信心、提升语言能力和积累社交技巧。虽然几乎所有学生都认为留学经历具有深刻价值，但他们对这段经历的感知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在国外学习和生活也是一个不断面对挑战和困难的过程，留学生活中一些宝贵的经验让人受益颇深。“在国外学习使我得以接触到了不同的文化和教育体系，这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我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职业目标和未来规划，也学会了如何独自应对困难，变得更加自信了。”（R05、R07）“出国后，我结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朋友，开阔了眼界，也提升了自己的语言能力，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让我积累了一些社交技巧。我还接触到了世界领先的科技研究和创新成果，提升自

己的专业水平。”（R03）

在留学初期，学生主要通过“向人求助”和“改变自己”两种理路对“初来乍到”的不适应感进行动态调节。具体而言，前者指个体依赖外部条件以改善现状，然而由于在异国他乡接触的人员存在不确定性，学生往往无法有效地获取帮助，反而使自身陷入习得性无助之中。“在留学初期，我曾与当地寄宿家庭生活在一起，虽然我有交谈的想法，但我们的交流十分有限，更多地依赖关键词和肢体语言，几乎没有涉及句法和语法。这种经历让我意识到寄宿家庭并不总是理想的语言学习和生活支持环境。”（R12）“改变自己”即个体通过自身内部驱动以积极应对留学生的生活，这部分学生更愿意付出努力去调整自己的认知与行为。“在国外第一年我很不习惯，觉得自己的生活一片迷茫。我努力调整自己适应国外的教育模式，逼着自己在课堂上积极主动地与教授和同学互动，勇于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保持谦卑的态度，不懂的地方耐心地问别人。另外在课余时间，经常参加学校或社

会实践活动，也是扩大朋友圈、快速融入国外环境的有效方式。”（R09）

（二）范围与交流：囿于初始二语语言水平的社交范围与仍有待提高的交流主动性

在问及受访者是否会与同学及教授进行交流时，绝大多数初始二语低水平的学生表示“交流有限”“几乎是被动交流”“有交流也是尬聊”。“我英语差，几乎是被动交流，英语知识的储备还没达到敢主动开口的程度。”（R01）“我语言基础也不是很好，班上全部是国际生，教授下了课就走，除了回答课堂问题，没有和教授或英语母语者进行过多交流。”（R08）而与之相反，前期二语积累已经达到一定高度，自我评价语言天赋还不错的学生特别强调频繁用英语交流的重要性：“我是英语专业出身，自我评价语言基础中高水平，在美国读博的时候与美国、印度同事的密切交流帮我适应了英语思维以及锻炼了用英语写论文的能力。我还结交了一个当地的女友，这也使我的口语、听力和写作水平突飞猛进。”（R11）该受访者还提到，与教授和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同学进行交流不仅能改善英语发音，自己还有意识地模仿当地人的口音，语音语调发生了转变——“我也能听能说外国方言了”。

除了初始二语语言水平外，个性特征、学习态度、人际关系和研究领域等其他因素也会对受访者的交流主动性产生影响，性格外向、积极向学、身边以国际学生为主的中国二语学习者交流意愿更强。“留学的头一个月我是听不懂上课内容的，因为涉及很多专业词汇，我本身学习态度比较积极，也热爱社交，课下就疯狂研究PPT，与母语是英语的同学请教，后来慢慢听懂适应了。”（R07）“因为都和中国学生一起上课，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也比较少，如果是和母语者聊天也是在小组讨论时间，很少一对一交流。”（R02）受访者反思交流匮乏原因还在于大家关注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互不相同，或者担心交流中的想法被他人剽窃等。

（三）影响与持久度：留学经历对产出型二语技能及跨文化理解能力起作用的持续性

对于留学带来的产出型二语技能的提升，访谈对象普遍持积极态度。然而，留学对产出型二语技能的影响及影响的持续性在口语和写作不同模块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口语技能的提升，回国后在外企工作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口音、语调、词汇复

杂度、流利度和准确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因为工作需要跟许多 stakeholders 沟通和协调，尤其是需要经常召集开会，每次会议开始的 briefing 就需要我去准备。这种情况下，起初觉得迫不得已，后来慢慢习惯了并且很乐于跟同事沟通，觉得自己的口语输出水平长进了很多，最重要的是减淡了对于英语的‘敬畏感’。”（R03）留学经历对产出型二语技能的提升还与受访者就读专业有关，如R07认为他的口语技能显著提升，但由于就读专业不需要完成太多写作任务，写作技能的改变不是很明显。“我几乎每天都沉浸在严格的同声传译训练中，需要快速处理信息并做出即时反应。巴斯大学同传专业有极其严格的毕业要求，我要进行充分的预习和复习来应对。”R11回忆起导师对实验室成员的科研要求非常严格，自己每天要写一篇文章，不断修改、润色，直到能用英文思维和逻辑写好学术论文，所以口语听力和写作能力进步飞快，基本能和当地人无障碍沟通。

部分受访对象表示回国后产出型二语技能有所下降，尤其是口语流利度和词汇记忆的水平有所下降。究其原因，归国后在没有高水平英语熟练度要求的工作职位、与以英语为母语者交流的机会较少或完全没有是二语水平大不如前的主要原因。“虽然偶尔会用到英语交际，但在大部分工作中还是缺乏英语交流的，回国后英语水平有一定退化。”（R04）但受访者也认为，这种情况并不能说明留学对产出型二语技能的影响“不持久”，因为“回到英语环境，还是会很快提升回来的。放下很久的话再拾起来会略有困难，但坚持听说读写一段时间就能恢复。”（R01）

谈及留学经历对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影响时，受访对象均表示自己让学生在丰富的语言交流体验中，增强了文化包容度，提高了文化洞察力，开始更加开放地接受新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我发现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美丽之处，都值得被尊重和保护。留学经历也深化了我对全球政治经济事务的理解，通过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和教授交流，我能够更客观地看待国际事务，避免受到单一国家或文化的偏见影响。”（R06）“相比出国前，我的文化洞察力和文化包容度得到了显著提升。我以前可能更局限在自己熟悉的文化圈子中，更容易受到民族意识或其他偏见的影响，但如今我更倾向于以中立客观的态度去看待

事物,善于接触更多信息并在深思熟虑后做出判断,以避免给自己带来了麻烦。”(R10)

还有访谈对象提到,到国外之后,通过与当地人近距离接触改变了先前的刻板印象。“在来到美国之前,我认为美国人非常个人主义,对他人很冷漠。有一次我独自开车去国家公园时轮胎爆了,但我没有注意到。直到我开进一个小镇,一对老夫妇告诉我轮胎瘪了,并主动帮助我换了备胎。这件事让我深受感动。我真正来到这个国家时才意识到,虽然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但并不像我之前想象的那样自我中心和冷漠”。(R09)

总体来说,留学经历对中国二语学习者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影响是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回国后,这种影响仍然持续,留学经历让我明白,世界是多元的,文化差异是存在的,而我所处的位置更像是一个观察者和学习者,而非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去评判优劣。这段经历让我更加谨慎、中立客观地对待不同观点,明白每一个现象都有其背后的原因和历史脉络。我更倾向于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和分析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做出一刀切的评价。”(R11)

拜勒姆(Byram)认为,跨文化交流能力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方面的适应能力,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学习者应能够识别价值观和信仰方面的差异,但不必全盘接受^[16]。留学经历使中国二语学习者对东道国文化的理解比在国内通过媒体能达到的理解要深得多,通过对比和反思,他们更尊重和珍视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了民族自信。“无论一个人身处何地,对自己国家的情感和归属感是与生俱来的,是根深蒂固的,不会因为身处异国而改变。无论我走到哪里,心中都会怀着对家国的热爱和祝福。”(R07)

(四)挑战与限制:文化差异和逆向文化冲击对回国适应的困扰与阻碍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习俗,有些虽然在中国属于常见的交流话题,但是在某些国家、民族就属于比较敏感的话题。“当我得知我同学的父亲几年前去世了,我询问她的母亲是否再婚。她立即脸色大变,并说:‘在菲律宾,年轻寡妇再婚是可以接受的,但我妈妈已经五十多岁了。如果她再婚,那就太荒谬了。’我立即打圆场,用英语告诉她我不熟悉菲律宾文化,也没有冒犯的意思。我补充说,在中国,寡妇晚年找老伴是人之常情。”(R08)在国内,人们交流中经常会主动询问别人

的婚姻状况,这是一种正常友好的交流。然而在某些国家,婚姻状况属于个人隐私问题,若是在交流中涉及婚姻问题,很容易引起误解,甚至造成文化冲突。因此,在留学时尽量做到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习俗是很有必要的。

“逆向文化冲击”可视作留学归国人员在离开留学目的国之后的跨文化适应过程^[17]。若该过程持续时间较长,会对留学归国人员的生活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对象提到了自己遭受到逆向文化冲击的影响。“有略微感受到反向文化冲击,回国后刚开始有点不太习惯,出国一年,朋友关系好像疏远了一些,刚回来有种被孤立的感觉。”(R02)“加拿大人很注重平衡生活和工作,不上班基本都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家庭时光。下班后和周末是法定的个人时间,偶尔老板让员工加班,除了支付额外报酬,还要表示歉意。而东亚文化强调集体的重要性,企业利益第一,个人服从集体,回国后我经常加班到忘记时间。”(R12)有学者将受到逆向文化冲击的过程描述为“情绪过山车”,逆向文化冲击对跨文化交际的主体的伤害比仅受文化冲击受到的伤害更大^[18]。有跨文化交流经验的主体在受到异文化冲击之后回到母国,虽回到曾十分熟悉的生活环境,使用的语言也恢复为母语,但母国文化会对经历过从异文化生活中归来的主体造成再次冲击,这种现象亟需引起关注。

五、研究发现

一是不同特征二语学习者对留学经历收获有不同的感知,主要包括独立生活能力、学术视野、职业目标、语言能力和社交技巧等方面。尽管留学经历被普遍认为具有深刻价值,但个体对其感知存在差异。在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个体对留学经历的感知与应对策略反映了其在新文化环境中的认知适应和发展过程^[19]。不同个体对留学经历的感知存在差异,可能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

二是初始二语语言水平会影响学生的社交范围和交流主动性。低水平的学生通常表现为交流有限、被动交流的特点,而语言水平较高的学生则更倾向于频繁使用英语进行交流^[20]。除语言水平外,个体的性格特征、学习态度、人际关系和研究领域等因素也会对交流主动性产生影响。外向、积极向学的学生更有可能展现出较强的交流意愿。这与社

会文化理论中语言作为思维工具和交流媒介在认知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个体的语言水平和交流主动性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影响的内容一致。

三是留学经历对中国二语学习者跨文化交流能力影响的持续性因人而异。留学生在跨文化环境中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人际交往提供了有力支持。留学经历对产出型二语技能和跨文化理解能力有持续性影响，这与社会文化理论中强调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个体的持续塑造相吻合。社会文化环境在留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种影响是稳定、持久和深远的。

四是逆向文化冲击也对学习者个体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回国适应等问题。在留学过程中，个体常常面临着来自新社会文化环境的挑战。留学生在回国适应过程中可能会面

临来自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和矛盾，他们需要逐步调整 and 适应，以避免或者减轻逆向文化冲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文化身份的统一和认知结构的重塑。

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为深入分析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可以解释中国二语学习者在留学时参与社会和文化活动，跨文化交流能力得到提升^[21]。他认为，如果没有个体自身的努力，即使空间和位置发生变化，个体能力也可能不会发生明显改变。语言学习是通过社会互动和交流来实现的，应该在真实的情境中进行，学习者在社会互动中通过观察、模仿和内化他人的行为、语言来建构知识。在二语学习中，学习者可以观察模仿当地人士的语言和文化表达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语言技能。留学经历对中国二语学习者跨文化交流能力作用机制模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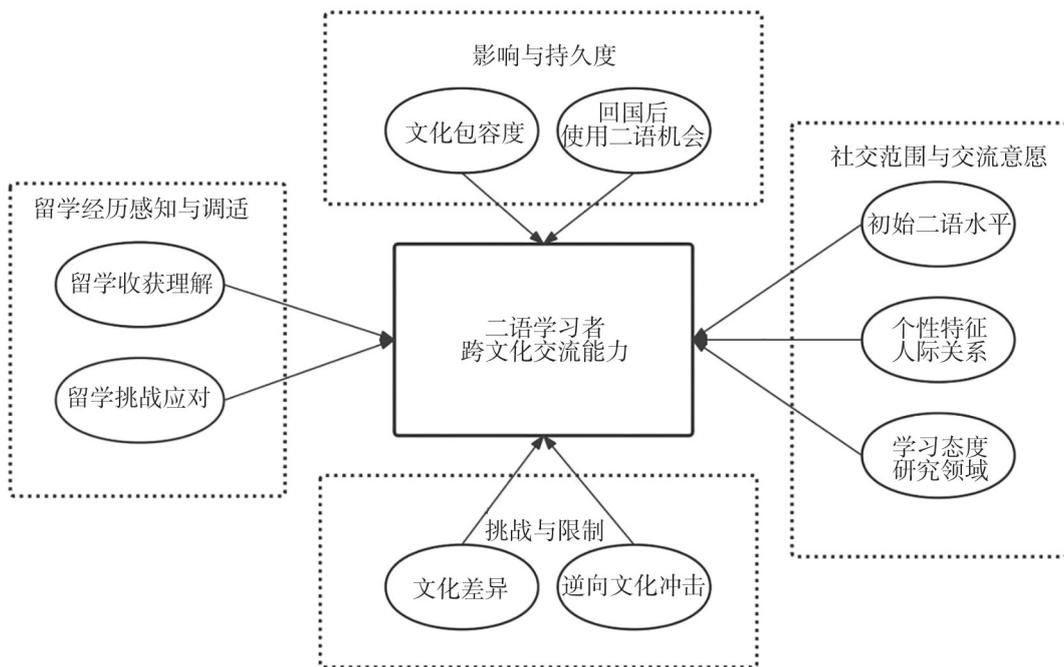


图1 留学经历对中国二语学习者跨文化交流能力作用机制模型

六、启示与建议

（一）有针对性地培训指导，促使留学生适应环境，形成互助网络

在学生出国前，学校和相关机构应提供专门的心理支持和文化适应培训课程，以帮助学员预见并

准备应对潜在的文化冲击和挑战。这些培训课程应包含情景模拟、案例分析以及具体的应对策略，使学生在实际遇到问题时能够从容应对和调整。这不仅有助于学生适应新的文化环境，还能提高他们的心理韧性和应变能力。此外，学校应鼓励中国留学生建立或加入现有的校友会 and 留学生组织，形成互助网络。这些组织能够为新生提供信息分享、经验

交流和情感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环境。通过与有类似经历的校友交流,学生可以获得宝贵的建议和支持,减少适应过程中的孤立感和无助感。为了进一步支持新生的适应过程,建议建立导师制度。让有经验的留学生或本地学生作为新生的导师,为他们提供指导和支持。这种一对一的辅导关系可以帮助新生更快地融入新环境,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同时,鼓励新生在初期遇到困难时积极寻求帮助,通过导师或组织获得必要的支持和资源,以避免陷入“习得性无助”的状态。通过这些系统化的支持措施,确保留学生在出国前和初期阶段都能获得全面的指导和帮助,从而顺利过渡到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之中。

(二) 语言强化和激励促进跨文化交流,提供充足的互动机会

在留学前或初期,应提供强化的语言训练课程,特别是针对日常交流和学术交流场景的训练。这些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提高语言水平,增强交流自信心,确保他们能够在不同的交流环境中自如应对。此外,应设计交流激励机制,例如设立语言伙伴计划,让学生与本地学生或其他国际学生结对,进行定期的语言和文化交流,通过互动学习促进语言能力的提高。为了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应组织各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如文化节、语言俱乐部和跨文化工作坊。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留学体验,还能为他们提供实践语言技能的平台,提升他们在真实情境中的交流能力。通过教育讲座和心理辅导,帮助学生认识到积极交流的重要性,培养主动学习和交流的态度。这些讲座和辅导应重点强调跨文化交流的益处,以及如何有效地进行跨文化沟通,帮助学生克服交流中的心理障碍。特别是针对性格内向的学生,应提供专门的心理支持和实践机会,帮助他们逐步提升交流主动性。这些支持可以包括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小组互动练习以及鼓励他们参加更多的小规模交流活动,逐步增强自信心和形成交流意愿。通过系统化的支持措施,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留学期间充分发展其语言技能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三) 增强留学生文化认同,采取干预措施助力留学生度过回国“过渡期”

在留学期间,应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各类多元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不仅限于校园内的国际文化节、语言交换项目和跨文化工作坊,还应包括社区内的

文化交流活动和国际志愿服务项目。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学生可以深入地了解并体验不同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和社区成员形成良性互动,有助于学生培养全球视野,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提升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回国后,为了帮助留学生顺利过渡到国内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学校和相关机构应提供全面的职业发展指导和心理支持。这些支持措施应包括职业规划咨询、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和心理辅导,以帮助学生应对职业发展和个人适应方面的挑战。通过这些支持,学生能够更好地融入国内职场,并充分发挥其在留学期间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

[参考文献]

- [1] 唐斌, 芮一丹. 留学教育投资的符号消费及反思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 (5): 22-29.
- [2] 吴建设. 出国留学语境下的二语习得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18.
- [3] LONG, M. H., & LONG, M. H. Problem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2007: 4.
- [4] 王瑞媛, 韩静. 留学经历对中国学生英语口语形态句法加工的影响研究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 31 (3): 91-96.
- [5] 孙有中. 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 [J]. 中国外语, 2016, 13 (3): 17-22.
- [6] TAGUCHI N, XIAO F, LI S. Effects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Social Contact on Speech Act Production in a Chinese Study Abroad Context [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6, 100 (4): 775-796.
- [7] 任伟. 出国语境下国际学生汉语语用能力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9 (2): 2-13.
- [8] ALLEN, H. W. What shapes short-term study [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0, 14 (5): 452-470.
- [9] SEGALOWITZ, N., & FREED, B. Context, contact, and cognition in oral fluency acquisition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4, 26 (2): 173-199.
- [10] CUBILLOS, J. H., CHIEFFO, L., & FAN, C. The impact of short-term study abroad programs on L2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skills [J].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2008, 41 (1): 157-185.
- [11] 吴建设, 罗小娜. A review of SLA studies in the study-abroad context [C] // 第二语言学习研究 (2016年第1

- 期总第3期).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016: 14.
- [12] MARTINSEN, R. A. Short – Term study abroad: Predicting changes in oral skills [J].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2010, 43 (3): 504 – 530.
- [13] KANG, DAE – MIN. The effects of study – abroad experiences on EFL learners'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speaking abilities, and participation in classroom interaction [J]. *System*, 2014, 42 (2): 319 – 332.
- [14] FREED, BARBARA F., e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a Study Abroad Context*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163.
- [15] NOELS, K. A., PON, G., & Clément, R. Language, identity, and adjustment: The role of linguistic self – confidence in the acculturation process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15 (3): 246 – 264.
- [16] JACKSON, J. Language, identity, and study abroad: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M]. London: Equinox, 2008: 48.
- [17] 孟亚茹, 张妍华, 郝佼. 社会文化理论中 perezhivanie 概念的解析——兼谈外语教育整体观的路径探索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4 (2): 11 – 19.
- [18] 朱志勇. 教育研究方法论范式与方法的反思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5 (1): 7 – 12.
- [19] 陈坚. 基于 STEM 教育理念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41 (6): 607 – 610.
- [20] BYRAM, M. From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o educ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itizenship: Essays and reflections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8: 67.
- [21] 蒋云斗, 刘晓楠. 短期留学人员归国后的逆向文化冲击研究 [J]. *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 2018 (4): 15 – 19.

(责任编辑: 孙永泰)

Study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Overseas Study Experience on Chines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DAI Fang – 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overseas study experiences influence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Chinese returnees, in – 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12 individuals who studied abroad and for whom English is a second language. Based on Vygotsky' s sociocultural theory,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influence durability a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dividual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to study abroad experience, social scope and communication willingness,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reverse culture shock. It is found that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hav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study abroad experience and initial second language level will affect students' social range and communication initiative. In addition, the lasting influence of overseas study experience on Chines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varies from person to person, and reverse culture shock also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ndividuals. In order to optimize students' study abroad experienc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t is suggested to carry out targeted training guidance to help students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language reinforcement and stimulation to promote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o provide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action; interventions to help them smooth the “transition” back home.

Key words: Overseas study experience; Second language studies;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ociocultural theory